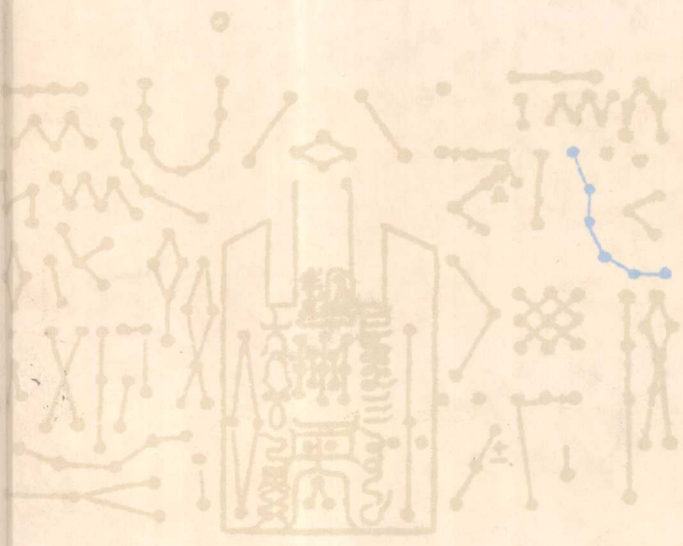


王兴平 黄枝生 耿薰编

中华文昌文化

——
国际文昌学术研究论文集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K203-53
8

中华文昌文化

——国际文昌学术研究论文集

王兴平 黄枝生 耿薰 编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文昌文化：国际文昌学术研究论文集/王兴平、
黄枝生、耿薰编。—成都：巴蜀书社：2004.3
ISBN 7-80659-563-5

I. 中... II. ①王...②黄...③耿... III. 文
化史-文昌-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K296.6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7098 号

责任编辑 谢艺波

封面设计 李南

中华文昌文化——国际文昌学术研究论文集

王兴平 黄枝生 耿薰 编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总编室电话 (028) 6656816

发行科电话 (028) 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成都市二仙桥东三段 5 号 (028) 84122206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2.25 字数 497 千

2004 年 3 月第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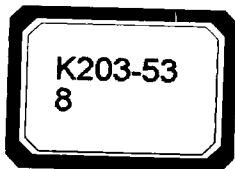
2004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100 册

ISBN 7-80659-563-5/I·203

定价：4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中华文昌文化——国际文昌学术研究论文集》

编委会

名誉主任：陈友学 卿希泰
主任：付学坤 蒋开恩
副主任：李和平 何仕忠 王兴平
成 员：赵红钊 史大美 汪启明
张泽洪 敬志国 耿 薰
孙 超 柳元兴 黄枝生
刘长荣

序 一

卿希泰

文昌帝君，既是民间所信仰的一位神灵，也是道教所尊奉的一位神灵。文昌本属星名，又名“文星”、“文曲星”或“文昌星”。星命家谓其为主持文运功名利禄的星神，故为一般文人士所信奉，视之为守护神。《儒林外史》第三回：“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道教也早有文昌信仰。《老君音诵戒经》即有“当简择种民，录名文昌官中”。该神在道教神系中地位甚高，《历代神仙通鉴》称其“上主三十三天仙籍，中主人间寿夭祸福，下主十八地狱轮回”。追本溯源，文昌帝君应是“文昌星神”与四川地方“梓潼神”相结合而产生之神，因此，文昌帝君信仰乃民俗信仰与道教的宗教信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是一个天人合一的综合体。古人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宋元以来，不少道士乃纷纷假托文昌或梓潼神降笔以制造各种经典，有的经典还流传很广，这便使文昌帝君信仰更加具有理论化的色彩，从而也就更扩大了它的影响力。长期以来，这种信仰既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的推崇，也深受广大下层民众的拥护，传播的范围也非

常广泛。以祀奉文昌帝君为主神的庙宇，不仅遍布内地各省市，港澳台地区也非常之多。据1992年《重修台湾省通志》中《住民志·宗教篇》的记载，仅台湾省内各县市，以祀奉文昌帝君为主神的宫庙即有27座之多。特别是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和海外华侨人数的增多，文昌信仰亦随着道教文化的外传而远播海外。

道教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主流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道教文化研究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在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已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现在亟须在此基础上向纵深两个方面进行拓展，而道教与民俗问题，便是亟待拓展的方面之一，对西蜀大地土生土长的文昌文化的研究，应属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文昌文化经过千百年来历史积淀和发展，它所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包含了伦理道德、音乐绘画、建筑雕塑、文学艺术、中医中药、科仪祭祀、民风民俗以及宗教学、民族学等，既是巴蜀文化中亮丽的风景线，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珍贵遗产之一，至今仍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备受当今国内外不少知名学者的关注，他们纷纷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对文昌文化进行了学术研讨。1996年9月，在文昌故里梓潼七曲山，召开了首届文昌文化学术讨论会，许多学者均在会上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成果。据初步统计，自1933年起至2002年止，已出版了文昌文化专著19部，在国外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昌文化的论文279篇。所有这些研究工作的开展，对于提高人们对文昌文化的认识和梓潼县七曲山旅游风景区的知名度，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中华文昌文化——国际文昌学术研究论文集》，便是四川东华综合科学院文昌文化研究所所长、研

究员王兴平，梓潼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耿薰，梓潼报社总编、县政协文卫委主任黄枝生等三位先生根据上述研究成果结集而成的。他们在国内外学者中做了大量的联系组织工作，经过七年多的收集整理，最后得以编辑出版。我们对他们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珍贵遗产之一的文昌文化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敬意。对县委、县政府和县政协的领导以及政协文卫委对此项工作的大力支持，对文昌学会、文昌文化研究所对此项工作的大力协助，也表示谢意。我相信这本《中华文昌文化——国际文昌学术研究论文集》的出版，不仅有利于文昌文化的研究、保护、开发和利用，对文昌帝乡梓潼县的文化旅游建设和经济建设会起到促进的作用，而且对于团结海内外的文昌信仰者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会有积极的意义。故乐于应编者的请求而为之序。

2003年6月24日于四川大学专家楼

序 二

沈伯俊

由梓潼县政府资助、王兴平等先生主编的《国际文昌学术研究论文集》即将出版了。作为梓潼人民的老朋友，我对此表示热烈的祝贺，并欣然为之作序。

以民间对“文昌帝君”的崇拜为表征的文昌文化，蕴涵着多种文化因子，经过漫长历史时期的吸纳、综合、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成为巴蜀文化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它传遍神州，远播海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

我是从1984年开始接触梓潼的朋友们的，迄今已经整整20年了。1984年4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宣告成立。这年夏天，谢汉杰、刘长荣等先生找到我和有关同志，介绍了梓潼的《三国演义》研究情况，希望我们予以帮助，我们当即表示热忱支持。经过一年的筹备，1985年6月，梓潼三国演义学会正式成立，成为全国第一个县级三国演义学会。20年来，我一直关心和支持着这个学会的工作。同样是由于这些朋友的敦促，从90年代初开始，我又与王兴平先生一起，积极支持梓潼的文昌文化研

究。记得我们曾特地到梓潼作学术报告，指出文昌文化是梓潼传统文化中最有特色的部分，对文昌文化的主要内涵及其研究价值予以阐发，受到当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

1994年底，我担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文化研究所所长后，依托本所的学术力量，加大了对文昌文化研究的支持力度。1995年2月，我和王兴平先生再次前往梓潼，与县委、县政府领导磋商筹建文昌文化学会，筹备文昌文化学术研讨会的有关问题。经过半年多的准备，这年9月，“四川梓潼文昌学会”正式成立，由王兴平先生担任会长，我为名誉会长。其实，我对文昌文化并无深入研究，只是出于对梓潼人民的友好感情，乐于成人之美而已。我一再表示不宜担任名誉会长，然而，梓潼的领导和朋友们坚持要我为学会工作出力。既然推辞不了，我就继续做一个热心人吧。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哲学文化所全体同志及省内高等院校同行们的共同努力下，又经过半年的筹备，1996年3月，“首届文昌文化研讨会”在“文昌帝君”发祥地——梓潼七曲山隆重举行。来自省内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和有关地区的专家学者50余人出席了这次研讨会，围绕“文昌帝君”的由来与文昌文化的源流、文昌文化的内涵和特征、文昌文化的影响、文昌文化的价值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整个研讨会内容充实，质量较高，为系统进行文昌文化的研究与开发开了一个好头。这次研讨会之前，我在自己参与编辑的《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第1期发表了王兴平先生的《文昌文化在外国》一文，为会议做了一定的舆论准备。会议之后，我们《中华文化论坛》又在1996年第2期设置“文昌文化研究”专栏，集中发表了我撰写的《首届文昌文化研讨会综述》、龙吟的《文昌信仰源流与文昌文化》、沈亦军的《试论〈阴骘文〉的德福

观》、黄枝生的《文昌圣诞与民间习俗》4篇文章，为会议作了有力的宣传。

岁月如流。转眼之间，十余年的光阴过去了。十余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参加文昌文化研究活动并不算多，但仍然关注着这方面的学术动态，有时也帮忙出一点主意。我高兴地看到，在梓潼各界人士和省内外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文昌文化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影响日益扩大；不过，无庸讳言，在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为此，在本书即将问世之际，我愿以老朋友的身份，对今后的工作提出几点建议：

其一，发扬严谨求实的学风，扎扎实实地搞好研究。对史实的考订、史料的解读、文物古迹的鉴定，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力戒不求甚解、望文生义甚至随意捏合的浮躁学风。对民间传说故事，要辨明源流，去粗取精，选择吸收，反对胡编乱造。在旅游宣传中，则要在“心中有数”的前提下，把握好史与文、实与虚的关系，既能分清二者的区别，又能做到融通文史，兼容并包，使历史、文学、传说相映生辉。

其二，充分尊重专家学者的意见。十余年来，为了推动文昌文化的研究与开发，一批专家学者在资料的收集整理、论文的撰写刊布、项目的规划设计上，耗费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有关领导和广大群众的尊重。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该继续强调这一点。当然，专家之间也会有不同意见，各种意见不可能全都正确，这就需要领导和有关部门博采众长、择善而从了。

其三，加强工作的计划性和连续性。梓潼的历届县委、县政府都很重视文昌文化的研究与开发，有力地推动了这一事业的不断前进。不过，应该看到，在工作的计划性和连续性上，仍存在

一些不足：有的项目定了计划却迟迟未能落实，有的事情有了好的开端却未能坚持，未免令人惋惜。我想，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长期性，高瞻远瞩，前后相承，持之以恒地努力下去。

其四，严格遵循《文物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按照科学的协调发展观，搞好景点的维护和建设，避免过度开发，切忌随意设点改建。

其五，努力培养本地的研究队伍。十余年来，最早参与文昌文化研究的老同志，有的退出了研究第一线，有的已归道山。为了保证研究的持续发展，一定要下决心培养本地的青年人才，争取从他们中产生有较高水平的专家。

展望未来，文昌文化研究任重道远，前途光明。我愿与梓潼的朋友们一起，为进一步推进这一研究，继续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2004年2月 于锦里诚恒斋

目 录

| | |
|--|-------------|
| 序一 | 卿希泰 (1) |
| 序二 | 沈伯俊 (4) |
| 文昌帝君信仰的起源及其神仙思想的道德决定论 卿希泰 姜 生 (1) | |
| 梓潼神历史探微 | 王家祐 (15) |
| 文昌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 | 王兴平 (25) |
| “梓潼神”与氐羌文化 | 萧崇素 (55) |
| 文昌信仰源流与文昌文化 | 龙 吟 (72) |
| 台湾的文昌帝君信仰与儒家道统意识 | 陈昭瑛 (87) |
| 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文昌帝君 | 张泽洪 (116) |
| 司禄之神文昌帝君 | 赵杏根 (132) |
| 文昌文化之广泛与魅力 | 刘长荣 (144) |
| 试论文昌文化的架构及成因 | 黄枝生 (155) |
| 张亚子初探 | 仇世增 (190) |
| 文昌文化与儒家文化之比较 | 敬永金 (195) |
| 梓潼文昌帝君源于邛海蛇神? | 陈和平 (200) |

- 融人、星、神一体的文昌帝君 谢焕智 (204)
- 文昌帝君渊源于龙蛇图腾崇拜 周朝海 (216)
- 初探文昌灵应祠遗址 黄枝生 (229)
- 善板祠及张亚子族属探考 黄枝生 (235)
- 《文昌帝君阴骘文》的伦理观浅析 李刚 (251)
- 道教善书《文昌帝君阴骘文》 陈霞 (260)
- 《红楼梦》·《阴骘文》·惠红豆 邓云乡 (268)
- 试论《阴骘文》的德福观 沈亦军 (278)
- 文昌《阴骘文》及民间美德之渊源谈 仇昌仲 (288)
- 西蜀《文昌大洞仙经》考述 黄海德 (296)
- 《文昌帝君化书》简评 (美) 克利曼 (304)
- 惜字律二种 辛德勇 (306)
- 刘安胜与文昌经 王兴平 (315)
- 文昌大洞经会考略 缪鸾和 (325)
- 洞经音乐调查记 周咏先 黄林 (执笔) (349)
- 云南洞经音乐初探 雷宏安 彭幼山 (374)
- 国宝埋藏在喜马拉雅云岭深处
- 为丽江纳西古乐团晋京演出作 何昌林 (391)
- 文昌崇拜与洞经音乐 王兴平 (409)
- 洞经音乐的形态特征 张兴荣 (437)
- “纳西古乐”名实谈
- 答《人民音乐》记者问 伍国栋 (449)
- 洞经音乐探源 王兴平 (457)
- 略论中国洞经音乐的起源及其流变 雷宏安 (488)
- 洞经会的危机和前景 (英) 李海伦 (504)
- 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的传说、曲牌及形态 桑德诺瓦 (513)

| | |
|-------------------------|-----------------|
| 文昌洞经音乐与道释儒雅俗文化 | 甘绍成 朱泽民 (532) |
| 洞经的儒道释文化融合 | 张兴荣 (537) |
| 梓潼文昌及洞经音乐 | 耿 薰 (553) |
| 崇拜文昌的历代雕塑 | 王兴平 (561) |
| “道法自然”的梓潼七曲山文昌宫 | 刘长荣 (580) |
| 文昌庙会与梓潼民俗 | 姚光普 (591) |
| 文昌圣诞与民间习俗 | 黄枝生 (607) |
| 论文昌文化的效应 | 陈祖湘 姜 生 (615) |
| 浅谈文昌文化的学术价值及其开发利用 | 仇本华 (618) |
| 龙牵凤绕梓潼山 | 王德奎 黄枝生 (624) |
| 1996 首届文昌文化研讨会述评 | 沈伯俊 (629) |
| 文昌文化的探索历程 | 王兴平 (634) |
| 文昌文化论著、资料索引 (1931—2003) | |
| | 王兴平 黄枝生 辑 (664) |
| 后记 | (698) |

文昌帝君信仰的起源 及其神仙思想的道德决定论

卿希泰 姜 生

文昌帝君是中国道教的重要神灵之一。文昌信仰向世人所提供的，不是传统的道教练养术，而是阐扬老子“重积德”的思想，宣扬通过以“善”为价值导向的内在行为控制，可以达到人间理想或成仙不死。文昌信仰的社会操作性淹没了它的神学操作性，正因如此，它在各阶层的社会生活和风俗文化中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

一、文昌神的起源及其与梓潼神崇拜的整合

在中国古代史上，“文昌”本为星宫名称，属紫微垣，包含六颗星。《史记·天官书》记载说：“斗魁戴匡（筐）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在斗魁中，贵人之牢。”古人为此六星所命之名，本身就具有十分耐人寻味的内在思想蕴义。因为，六星之名称，犹如人间的将相公卿，似乎是它们各自职辖的一种标示。在中国古

代，形成了以文昌信仰为核心的神话传说。如屈原《楚辞·远游》：“载营魄而登霞兮，掩浮云而上征。命天阍其开关兮，排阊阖而望予。召丰隆使先导兮，问大微之以居。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朝发轫于太仪兮，夕始临乎于微闾。屯余车之万乘兮，纷容与而并驰；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逶蛇……后文昌使掌行兮，选署众神以并轂。路曼曼其修远兮，徐珥节而高厉；左雨师使径待兮，右雷公而为卫。”^①这表明，至迟在屈原的时代，作为天上星宿的文昌已被援入古代神话系统，演绎成为天上具有相当权力的神，称为文曲星、文星，主宰着人间的功名和禄位。《孝经·援神契》云：“奎主文昌，仓颉效象洛龟，曜书丹青，坐（同‘垂’）萌画字。”宋均注：“奎星屈曲相钩，似文字之画，仓颉视龟而从画，则河洛之应，与人意所惟通矣。”^②古人认为，“奎主文章，仓颉文字者，总而为言，包意以名事也；分而为义，则文者祖父，字者子孙。”天上众星象所成之文，即古来所谓“天文”。“得之自然，备其文理，象形之属，则谓之文”^③。《孝经·援神契》解“文昌宫”之文化蕴义曰：“文者，精所聚；昌者，扬天纪。辅拂并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宫’。”^④《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卷2：“文者理也，如木之有文，其象交错，古者仓颉制字，依类象形；昌者盛也，大也，言天地之文理盛大也。”^⑤或许这就是古人相信“文昌”主宰人间知识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功名、利禄，进而对其虔敬和膜拜的原因所在。

随着历史的推进，天上的星宿不仅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与人间事务密切相关的神性，而且逐渐同被神化了的世间人物相参同附会，于是，人间至贤的精神被映射到天上，成为天上的神灵。经过这样的转化和重铸，文昌成为一个伦理符号。文化形态的这种

演变，不仅有一个漫长的整合过程，而且人间的价值和审美逐渐成了它的核心要素。

关于梓潼文昌帝君的身世和姓名等，有多种说法。据《清河内传》载元渝州刺史赵延之所撰《行祠记》说：“帝君储精列宿，降自有周，姓张讳仲，字孝友。辅宣王中兴，没为神明，累朝咸有大功，尤孜孜以忠君孝亲，扶植斯文，化淑民心为任。”^⑥《梓潼帝君化书》亦以帝君自言称其“自周历晋”^⑦多次出没世间，教化救世。

《文昌帝君本传》称：“文昌帝君，姓张，讳善勋，周初吴会间人也。”其始祖是黄帝之子，因其“始造弦张弓，世掌其职，子孙因以为氏”，因而成为吴之显姓。文昌帝君乃是至孝之子。道经说：“张母少勤苦，六旬而疽发背，医覈罔效。帝君计穷，既为吮咀，乃病久食少，复成羸瘵。医曰：‘此痼疾，以人补人，庶可平复。’帝君剔股供之。空中语曰：‘上帝以汝纯孝，延汝母寿二纪。’翼日，勿药果瘳。”后来父母因疫毒流行，同日而逝，“帝君亲持畚鍤营葬，庐墓三年，有二白雉栖树，祭则飞鸣而下，终制不见。葬五年，墓西水暴发，欲改卜，无及，乃斋戒守坟，日夜诵《大洞经》，并取向所奉金像，严事之墓前，溪谷变成坚壝，皆孝感之所致也。”道经说，文昌帝君“其在晋武帝时为张亚，时太康八年丁未二月三日，生于两越之间”。并称周以后，文昌帝君历七十三化。有神吏语之曰：“君在天谱得神仙之品，于人世鲜有知之者。晋有中兴之兆，君可寻方显化。”晋朝“元帝（即司马睿，317—322年在位——引者）南渡，绥抚江左，帝君作儒士，称谢艾，跨白驴往河西应孝廉”，仕于东晋，曾以三万步骑大败敌寇，后战死；“士民于阆中梓潼县立庙祭祀，称‘梓潼君’，庙在九曲之北。有降笔亭……其降笔多劝人以忠孝，